

# 芒砀山汉墓墓塞石刻考察

朱梦远

**【内容摘要】**芒砀山汉墓出土的墓塞石刻是西汉时期重要的文字遗存。这些墓塞石的石料主要采自保安山西南侧，塞石刻多分布于保安山二号墓，保安山柿园墓，窑山二号及僖山一、二号墓。塞石刻字较少，以十余字较为常见，刻文内容涵盖墓石位置、尺度、完工日期、石工姓名及职官等信息，这些塞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诸侯王陵墓的营造制度。书体则呈现出篆书向隶书过渡的演变轨迹，兼具篆隶、古隶及汉隶多种风格，为研究西汉文字演进与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芒砀山汉墓；墓塞石刻；篆隶过渡；西汉梁国

## 引言

河南永城芒砀山汉墓群出土的墓塞石刻，以其文字资料数量之丰富、内容涵盖之广泛，在汉代考古发现中尤为罕见。部分塞石表面刻文密集，近乎一篇短文，内容涉及工匠姓名、纪年、石材尺寸、职官名称、陵寝方位布局、墓室定名与功用等多个方面。这批材料不仅是研究汉代陵墓建筑、历法变迁、度量规制的重要实物依据，同时也为书法艺术演变及文字学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 一、石料来源

自 1990 年起，考古单位陆续于保安山二号墓、保安山柿园墓、窑山二号墓、僖山二号墓等汉墓的墓道与甬道内，清理出大量刻铭墓塞石。此类塞石

可能源自同一采石地点。

经勘查，上述墓葬所在山体周边未见大规模开采遗迹，且山表多为页岩，其下亦为页岩与石灰岩互层，地质条件均不适于开凿墓塞石所需之大规格石料。芒砀山群中，保安山石质最佳，较宜开采制作塞石，其西南侧至今仍保留古代采石遗迹。《水经注·获水》谓：“获水又东迳砀县故城北。应劭曰：县有砀山，山在东，出文石，秦立砀群盖取山之名也，王莽之节砀县也。山有梁孝王墓。”<sup>[1]</sup>

梁孝王葬于砀山，历来史载无异，今考古所见梁孝王墓即位于保安山。西汉时有芒、砀二县，砀县属梁国，高祖刘邦早年曾“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sup>[2]</sup>。

说明至汉代“芒”“砀”仍常分别指称。芒砀山亦简称为芒山。《水经注·获水》又云：“陂水东注，谓之谷水，东迳安山北，即砀北山也。”<sup>[3]</sup>

可知安山即今保安山，保安山实为砀山的一部分，其南麓曾有保安镇。砀山以北最高峰为芒山，保安山为芒砀山群中仅次于芒山主峰的山体，不仅山势高大，石质亦优于芒山等地，是一处条件优越的天然采石场。《汉书·地理志》亦载：“梁国，故秦砀郡，高帝五年为梁国……县八：砀，山出文石。”<sup>[4]</sup>唐代李白也曾目睹了芒砀山上万人采石场景，并留有《丁都护歌》云：“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万人凿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可见，至唐代保安山仍然是重要的采石基地。因此，窑山、僖山等处汉墓所用墓塞石，很可能均采自保安山西南侧，经加工后运送至各墓葬所在地。

## 二、石刻分布

芒砀山群的保安山、夫子山、铁角山、僖山、窑山等山体中共埋藏汉代墓葬数十座。而在这些汉墓发掘过程中，大多汉墓都有数量不等的刻有文字的墓塞石出土，其中以保安山二号墓、保安山柿园墓、窑山二号墓及僖山一、二号墓出土数量最多<sup>[5]</sup>，内容丰富，且涵盖了篆书、隶书等多种书体。

保安山二号汉墓为梁孝王王后李氏之墓，位于保安山北山头，南面与梁孝王墓（保安山一号墓）并列，相距约二百米。保安山又称安山，在芒砀山群中仅次于芒山，为第二大山体，位于芒砀山主峰东南。1990年当地村民在其北山头开山采石时发现了这座汉墓，1992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当地文化部门开始进行全面考古发掘。该墓在芒砀山汉墓群中规模最大，构造最复杂。它的发掘不仅为研究西汉陵寝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发现了西汉铁制工具的进一步使用。该墓亦是迄今发掘所见出土墓塞石数量最多的汉墓，同时也是墓室规模最大的石崖墓。今在该墓的东、西墓道发现多处盗洞，表明历史上该墓曾多次遭到严重的盗掘。墓道内靠近墓门及侧室门道的墓塞石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但仍然清理出墓塞石三千余块，其中东墓道处发现完整塞石二百余块，前庭处发现完整塞石八百六十余块，一号甬道处发现完整塞石四百三十余块，二号甬道发现完整塞石二百余块，三号甬道发现完整塞石四百余块，

西墓道发现完整塞石六百三十余块。这些墓塞石上大多刻有文字，少量墓塞石上还有朱书文字。

保安山柿园汉墓为梁孝王之子梁共王刘买之墓<sup>[6]</sup>，位于保安山东南部。1986年被当地开山采石的群众发现，后经有关部门批准，于1987年由原商丘地区文化局进行发掘。该墓墓道及甬道全部被塞石填充，清理出墓塞石两千余块，其中有一百余块塞石上刻有文字，其上共发现刻字一千一百字左右。据当地文物部门记录，这些刻字塞石自东向西第八排以东较多，而且越靠近墓门刻字石条越多，上层封石及第八排以西的封石几乎无刻字，刻字位置多数在石条的下面右侧，其次在石条的中部或右上位置，少数在石条的侧面。这些刻字均为竖行，两行者从右向左读，少数也有从左向右读的，字头皆朝向墓门，个别石条的刻字不成句，亦无连贯文意，只记录了一些零散的信息，如只刻“甲”“乙”等编号或“甲”和其他几字分散刻于同一石面。<sup>[7]</sup>

窑山二号汉墓位于窑山山顶北侧。窑山是芒砀山群中偏西北的一座小山，其正东方向是芒砀山主峰，目前在该山已发掘两座大型石室墓。该墓1989年由当地群众在附近追捕狗獾时发现，同年原商丘地区文化局对墓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当时出土报告中称其为“前窑汉代石墓室”<sup>[8]</sup>，1993年原商丘地区文物队再一次发掘时将其改名为“窑山二号汉墓”。此次发掘，出土汉代器物一百余件，在墓室南北两壁及墓道内发现带有刻字的塞石二十余块。该墓与保安山一、二号墓及柿园墓不同，为一处石室墓，相比需数十年才能完成的石崖墓，其形制简单，规模也较小，主要由一个墓室及墓道组成。但从该墓中出土的刻有“曹君宝石”“孟子天石”“漕载次君”“皇儿”“皇侖”等字塞石来看，此墓主身份并不普通。我们知道“天石”“宝石”不是一般的贵族身份所能称呼的，再者，塞石中的“皇儿”“皇侖”应是墓主人的后人为其刻石的自称，后人能够以“皇儿”“皇侖”自称也足证墓主人身份之尊贵。当地文物部门称此墓与窑山一号汉墓为西汉中期以后至西汉末的梁国国王和王后的“夫妻同茔异穴合葬墓”<sup>[9]</sup>。此说较为符合西汉梁国后期的发展状况。梁孝王以后，梁国一分为五，分别为梁国、济川国、济东国、山阳国、济阴国，

后四国土地相继归入汉郡。<sup>[10]</sup>到梁襄王时，汉武帝有意削弱诸侯王势力，《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余尚有十城。”<sup>[11]</sup>汉武帝用借罪削地的形式又削掉梁国八城。此时梁国仅余十城<sup>[12]</sup>，国力早已大不如前，再难长期承担“石崖墓”建造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至汉成帝元延年间，梁王刘立又因杀人罪，被成帝“削立五县”。所以，“石室墓”的最早出现和流行应在西汉中期以后至末期。故推测此墓应为汉昭帝之后的某位梁王或梁王后之墓。

僖山一号汉墓，位于僖山山顶东侧。僖山是芒砀山群中最东的一座，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西与保安山相望，其南麓山下即为芒山镇僖山村。目前在该山已发掘和清理出三座墓葬，其中有两座石室墓（僖山一号汉墓和僖山二号汉墓）以及一座汉画像墓，1984年商丘地区文物工作人员在僖山考察时被发现，随后为进一步厘清墓葬情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商丘地区文物局于1986年对此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当时称僖山王室贵族墓，并认为疑似西汉晚期梁夷王刘遂的墓葬<sup>[13]</sup>，亦有学者认为此墓为梁王刘嘉之墓。<sup>[14]</sup>该墓为一座竖穴石室墓，墓内出土汉代玉器、兵器、礼器共计千余件，并在墓道后段清理出墓塞石四百余块，其中大部分塞石上都刻有文字。

僖山二号汉墓位于僖山顶部正中位置，一号汉墓在其东侧，两墓东西相距五十米左右。其亦为竖穴石室墓。1993年该墓被盗，破案后文物得以追回。后经批准，1995年商丘地区文物工作队联合当地文物部门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出了少量的陶器、铜器、玉器。该墓平面似“甲”字形，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墓室内共发现带有文字的墓塞石53块，主要位于室内南北两壁和顶部斜坡上，墓道部分由于山体四周已成悬崖，墓道内的塞石无法进行清理，故暂未发掘。该墓与僖山一号汉墓皆是位于僖山山顶的主墓，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出土的玉衣片的孔穿内还残存有金丝或金箔，说明墓中的原殓服为金缕玉衣，其为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二号墓为梁国某王或王后之墓毋庸置疑。僖山一号墓多见兵器和礼器，而该墓则未见兵器，

只有少量玛瑙串珠等女性饰品出土。僖山一号墓封土有近八米之厚，而该墓封土厚度则不足五米，王墓的封土冢多大于王后墓。再据芒砀山群其他汉墓的规律，王墓一般南北并列，王墓在南；东西反向的，王墓一般墓道朝东，王后墓道朝西。故该墓应为僖山一号汉墓的王后墓。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理上述墓葬出土的墓塞石过程中，不论是墓道内塞石还是甬道内或前庭内塞石，封堵时都考虑到了空间限制和难易程度，并且经过极其细致的设计规划。一般底层塞石都较厚，保安山二号墓中西墓道最下层塞石体积是最上层塞石体积的一倍。三个甬道内的塞石，因空间限制，封堵更加困难，故上层塞石更薄一些，这样封堵时就较为容易。另一方面，为了使甬道内塞石不易因倾斜而滑脱，凡是甬道斜坡的底端都采取了榫卯结构。为了将甬道内空间完全塞实，三个甬道内塞石被逐排塞堵，并根据塞石大小、位置标注序号，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塞石上出现了序号、尺寸等信息。诸如此类，表明当时墓塞石在堆叠时经过了精心设计和合理的安排，体现了汉代匠人高超的工艺和惊人的智慧。

### 三、文字内容

永城芒砀山汉墓出土墓塞石刻文字篇幅较短，多则二三十字，少则仅一二字，以十余字较为常见。目前已清理刻铭塞石上万块，按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

#### （一）记录墓塞石位置的刻字

如窑山二号汉墓墓顶北坡出土的刻有“北”字的塞石，僖山一号墓南北两壁上出土的刻有“东北”“北”等字的塞石，以及保安山二号墓出土的“西宫东北旁第一三”“东宫东北旁第三二”“东宫东南旁第三四”“西宫东北旁第二二第二北”等石。这些塞石刻字所指示的位置与实际发掘清理时的情况基本一致。还有一些塞石仅刻有数字编号，这类塞石在保安山二号墓出土较多，其所刻编号表示具体的位置。如“第廿一十二”“第五廿二”“第八五十六”“第三五十八”“第九二十三”“第五五十一”等石，我们以“第廿一十二”为例，“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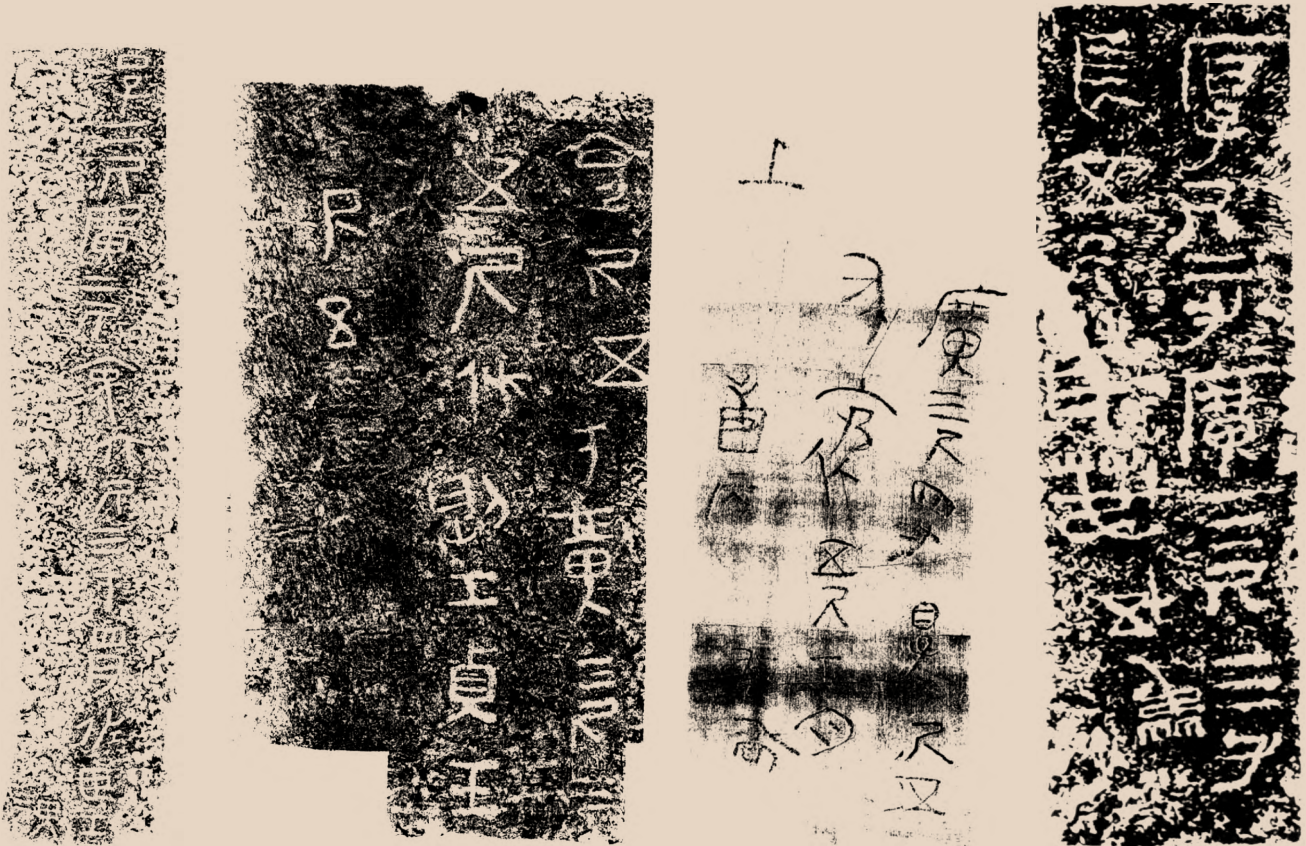
图一 记录墓塞石位置的石刻拓本 选自中州古籍出版社《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

字用于数词前表示次序，“廿一”为当时封堵时该石所在层数，“十二”为该石所在的列数，此顺序与发掘时的顺序吻合。这种记录方式科学高效、准确严谨。保安山二号墓还出土了十余块刻有“始施南方”“南方三施”“四施南方”“五施南方”的塞石。这些塞石位于其2号甬道，其“施”字，古代通“挖”，“挖”是“拖”的本字，也作“抛”，其义为牵引、曳引，在这里可以释为拖运、运输，应与塞石等石材的施工有关。“南方”则表示方位，“始”“三”“四”“五”等表示“施南方”的次数。以上种种，反映了当时墓塞石的施工事先有着周密的规划及细致的步骤，每块墓塞石的编号都对应着具体的摆放位置，并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施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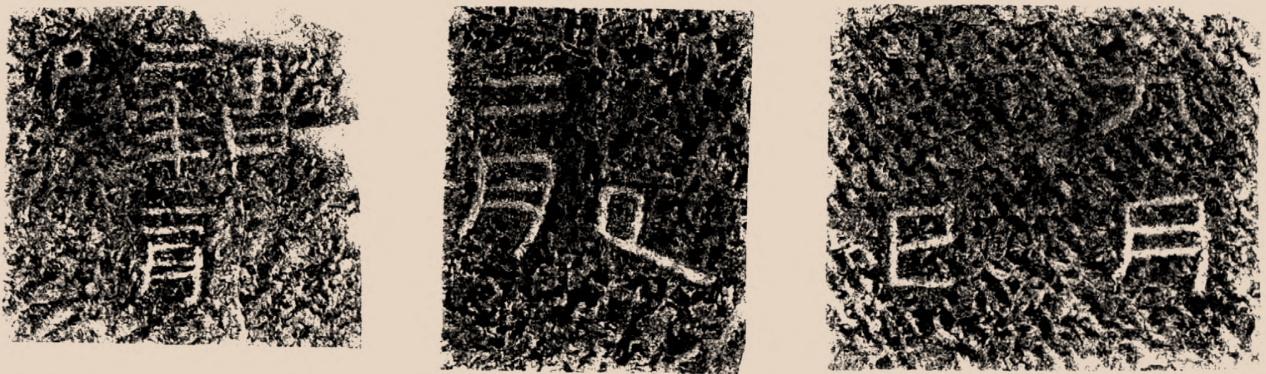
#### （二）记录墓塞石尺度的刻字

这类塞石一般先记录厚度，再记录广（宽）度，最后记录长度。部分“厚”字写作“旱”字，“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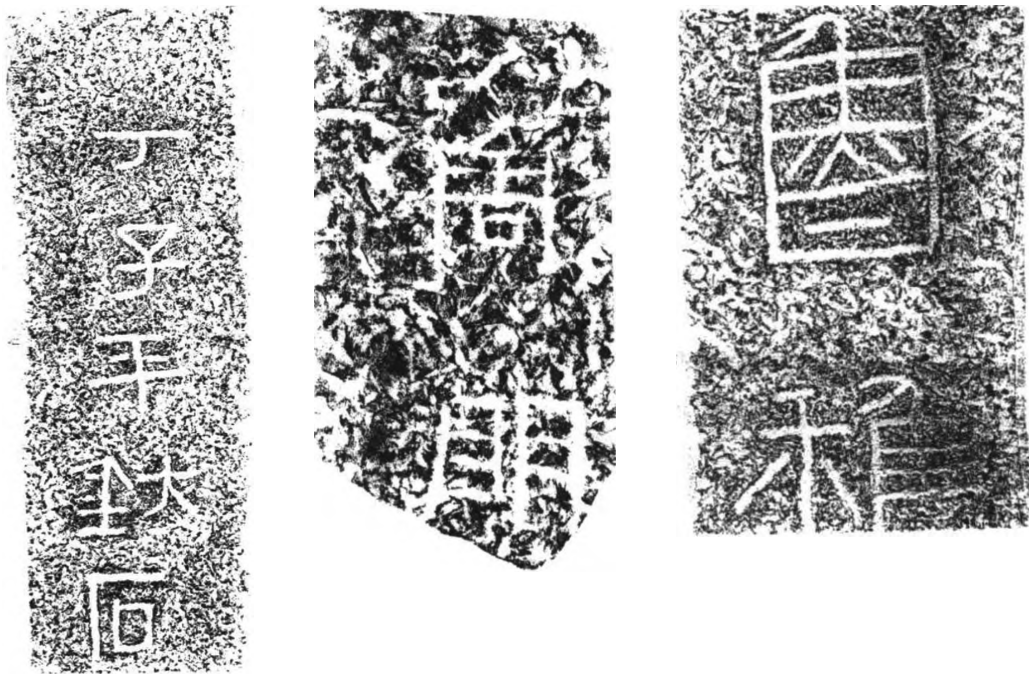
字则用“袤”字代替。“袤”在汉代与“长”字通用。《说文·衣部》：“袤，从衣矛声，一曰南北曰袤，东西曰广。”<sup>[15]</sup>此处的“袤”字指塞石的纵长。西汉时，尺度等度量衡已经十分成熟。《汉书·律历志》载：“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sup>[16]</sup>可见，此时度量衡已形成规范体系并被广泛应用。出土塞石中凡表示尺寸的数字均用“一”“二”“三”“四”“五”等写成。在“尺”和“寸”字的前面为“一”的数字有时会省去不写，而直接写作“尺”或“寸”，“尺”字后边有时也简省“寸”字而不写。部分塞石仅刻“厚”或“广”其中的两项，亦仅有刻其中一项者。值得一提的是，



图二 记录墓塞石尺度的石刻拓本 选自文物出版社《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



图三 记录墓塞石完工日期的石刻拓本 选自文物出版社《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



图四 记录墓塞石石工姓名的刻字拓本 选自文物出版社《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

并非所有刻尺寸都是表示该塞石的尺度，如儋山二号汉墓发现的“此下四尺四寸周”，该塞石经测量厚0.41米，长、宽为0.6米，显然所刻尺寸与此石规格无关，推测刻字内容“四尺四寸”指该塞石距底部的高度，“周”字则为刻石工匠姓氏。此外，经实际测量，永城芒砀山汉墓墓塞石上所记录的尺度，其一尺在22.7厘米至24.6厘米之间，与以往学者研究所得数值相近。<sup>[17]</sup>

#### （三）记录墓塞石完工日期的刻字

这一类塞石一般多将日期刻于石块的侧面及中间位置。如儋山二号汉墓出土的刻有“曹二年二月巳”“二月巳”“九月巳”“八月十四巳”“八月十五”“八月十九巳”“八月四”等塞石。其中以刻写某月某日的居多。日期之后的“巳”字，通“已”字，即完成的意思。日期前的“曹”等字，为刻石工匠的姓氏。如“曹二年二月巳”，即曹姓工匠二

年二月完成了塞石的加工。还有一类塞石用干支来表示完工日期，如保安山二号墓出土的“十二月丙寅”“七甲戌”“七甲辰”“九乙丑”“四月丙申”“乙丑”等。以“七甲辰”为例，“七”即“七月”，“甲辰”即“甲辰”之日。

#### （四）记录墓塞石石工姓名的刻字

石刻中的石工姓名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刻有工匠名的，如窑山二号汉墓出土的“丁子平”“周明”“鲁稚”等石。汉代给有重要身份的人筑墓，往往征调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并在这些塞石上刻上工匠的名字；二是有工匠及监工名的，如保安山二号墓出土的“佐崖工禄”“佐昌工婴”“佐崖工偃”；前者为监工姓氏，后者为工匠姓氏。这类塞石除了刻有监工与石匠外，大多前面还刻有尺寸及日期信息，如柿园出土的“厚尺五寸广四尺一寸袤六尺正月庚辰佐崔工尚”“厚二尺广三尺三寸袤

五尺七月甲戌佐则工席”等石。这些塞石应该是在加工成型后，按要求在塞石上面刻上尺寸及日期，最后刻上石匠及监工的姓名，此为“物勒工名”制度之佐证。

#### （五）其他刻字墓塞石

这类塞石数量不多，有些塞石刻有官吏名，如窑山二号汉墓出土的“丙田长史”“□大夫”等石，“丙田长史”中的“丙田”有学者认为是地名，今于史无载，或为小地名，但更可能是人名。“长史”一职战国末年已置，李斯至秦，曾任此官。汉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诸府均置长史，秩千石，诸侯王也设长史，负责上计，职如郡丞。<sup>[18]</sup>“大夫”亦是古代官衔，汉时设御史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等。《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sup>[19]</sup>很长一段时间梁国除太傅、丞相由朝廷直接派驻外，其他文武官员均来自梁王的委任，上述“丙田长史”“□大夫”很大概率参与了墓葬的建造。有些塞石刻字或反映墓主身份，如上文提到的窑山二号汉墓出土的刻有“曹君宝石”“孟子天石”“漕载次君”“皇儿”“皇侖”等塞石，可知墓主身份并不简单，上文对此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还有些塞石刻字较为特殊，在保安山二号墓出土的部分塞石中还发现刻有标点符号的塞石，这类标点符号均刻于数字序号之间，分为直线折角型符号与折角呈弧线型两种。

从目前清理出的塞石刻字中可以看出，记录墓塞石位置序号的刻字最多，其次为记载塞石尺度、石工姓名、完工日期的刻字。每块塞石上所刻文字内容的种类也多寡不一，最多的刻有四类内容，分别刻有塞石位置序号、尺度、完工日期、石工姓名，如保安山二号墓出土的“第十一十厚九寸广三尺三寸长五尺九丙寅何徒印”刻石。

## 四、书法特征

从书法史视角考察，这一时期正值汉字书写体系发生显著变革的“隶变”阶段，字体呈现出鲜明

的篆隶过渡特征。永城芒砀山汉墓群出土的墓塞石刻字，或为篆书，或为隶书，其中多数则表现为篆隶杂糅的形态，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西汉早中期篆书向隶书演进的实际面貌。依据字体形态及演变程度，可将这批刻石文字大致划分为“篆隶”“古隶”“汉隶”三类。

“篆隶”即保留篆书形体结构，以隶书的笔意书写篆书结构的书体。<sup>[20]</sup>永城芒砀山汉墓墓塞石中的“篆隶”刻石，主要出土于保安山二号墓。据考，该墓为梁孝王李氏墓。<sup>[21]</sup>梁孝王时期小篆仍是官方正体，因此该墓出土了大量刻有篆书的墓塞石，其书体结构虽然为标准的小篆，但其点画中已带有一丝隶意。与官方刻经不同，这些出土塞石上的刻字书体并无一定之规，书体变化多样。据整理，“南”字写法有八种，“广”字写法有七种，“寸”字写法有五种，“厚”字写法有五种，“第”“旁”“乙”“佐”“袁”“庚”“已”等字的写法也有四种之多，有的是因简化、讹变而出现的一些异体字，有的则使用通假字等。值得一提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将隶变的偏旁或点画写为篆书，从而形成了一部分与原本篆书不同的书体。如东墓道塞石刻字书体庄重肃穆，点画粗细一致，结构匀称规整。而西墓道塞石刻字书体则更加浑朴敦厚，点画粗细不一，结构紧凑充盈。一号甬道塞石刻字书体较小，点画瘦硬，而二号甬道塞石刻字书体则字大盈尺，点画也更加粗阔。出现上述字体写法与书体风格的多样化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刻写者的不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文字的使用尚不十分统一。

永城芒砀山汉墓墓塞石中的字体除“篆隶”外，还有“古隶”与“汉隶”两种。“古隶”即秦书八体中的隶书。关于秦代古隶，自古以来存在诸多解释。近代以来随着出土资料的增多，学界更趋向于裘锡圭先生的解释：“一般把隶书分成古隶和八分两个阶段。八分指的是结体方整，笔画有明显的波势和挑法的隶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汉隶。八分形成以前的隶书就是古隶。”<sup>[22]</sup>由此可知，“古隶”处于篆隶之间。这类“古隶”书体在芒砀山汉墓群出土刻石字体中占比最多，且样式各不相同。如柿园汉墓墓道内出土的一百余块刻石文字，既有隶书特点，

又有较多秦篆遗风，有的或可称草篆，皆为篆书向隶体发展的过渡阶段书体。显然，处于篆隶过渡阶段的“古隶”样式很多，很难像“八分”书一样对其书体特点进行总结。但是，这些刻字也有共同之处，就是其书体大多未完全脱离篆书的写法，且整个刻字书体都较为扁方。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所述：“西汉人变秦篆长体为扁体，亦得秦篆之八分。”<sup>[23]</sup>永城芒砀山汉墓墓塞石中的“汉隶”刻石，主要出土于窑山二号墓，该墓中除了个别字还保留少许篆书特征，其绝大多数刻字的书体应属于“汉隶”的范畴。这批塞石上所刻书体与东汉时期的隶书已十分接近，其点画朴实、简洁，有些字体完全是隶书的结构，只是鉴于刻工的刻法及工具的原因，有明显波挑的书体不多，更多是一种以实用为主的隶书。

## 结语

目前西汉出土的石刻数量极少，也正因如此，永城芒砀山汉墓出土的近万块墓塞石中的数万文字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长期以来，一些偏远或贫困地区的文化遗产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及保护，如永城芒砀山柿园汉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曾先后多次被盗掘，诸多汉墓群出土的刻有文字的墓塞石至今仍被摆放于墓道两侧，并未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及研究。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更是给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指明了方向。由此，有必要对永城芒砀山汉墓墓塞石刻的价值重视起来，对其进行系统性挖掘、搜集、整理与研究，可以深入了解西汉民间书法的刻写与变迁。除此之外，这数万字的墓塞石文献，对于西汉文字演进与区域文化的研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 注释：

- [1][3] 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560.  
 [2] 司马迁．史记：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9:348.  
 [4]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36.  
 [5] 因部分墓葬中的塞石就地保存而未发掘，故其塞石是否有刻字，情况不详。

[6] 有学者提出此墓并非梁共王刘买墓，详见刘瑞．河南永城保安山柿园汉墓墓主考[G]//考古学集刊：第18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372.

[7][9][14][21] 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00, 276, 257, 5.

[8] 刘兆云．河南永城前窑汉代石室墓[J]．中原文物，1990(1):9.

[10] 《史记·梁孝王世家》：“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七岁，坐射杀其中尉，汉有司请诛，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地入于汉为郡……济阴哀王不识字，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阴王。一岁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详见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9:2088—2089.

[11]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9:2088.

[12] 另有“梁尚余有八城”一说，详见班固．汉书：卷四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2:2215.

[13] 商丘博物馆．永城芒山发现西汉梁国王室墓葬[N]．文物报，1986—10—31(1)．

[15]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70.

[16] 班固．汉书：卷二十一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966.

[17] 吴承洛最早得出西汉一尺合27.5厘米，新莽一尺合23.04厘米，东汉一尺合23.04厘米或23.75厘米的结论，详见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63；曾武秀认为西汉一尺为23.1厘米，新莽一尺为23.1厘米，东汉一尺接近24厘米，详见曾武秀．中国历代尺度概述[J]．历史研究，1964(3):163；丘光明厘定西汉尺度一尺长23.1厘米，新莽尺长23.1厘米，东汉尺长多在23—24厘米之间，并指出两汉400余年尺度基本保持统一，详见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38—54.

[18][19] 班固．汉书：卷十九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2:725—726, 727.

[20] 陈松长．马王堆帛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327.

[22] 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遗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J]．考古，1974(1):46.

[23]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G]//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783.

基金项目：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洛地区汉代石刻文献书法研究”（2025CYS047）、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河南永城芒砀山汉墓墓塞石刻研究”（26E16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责编：常海琴